

脑死亡的立法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，必须十分慎重，同时要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。第一，脑死亡的诊断标准要有。第二，脑死亡立法的技术规范要定下来。第三，就是脑死亡立法的管理程序和管理办法。这三个完成了以后，有关部门才能颁布脑死亡的法规。只有立法了以后，才能开始进行一些试点，试点以后才能在全国铺开。最重要的一步，脑死亡的诊断标准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，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照搬国外的标准。

美国器官移植的立法，脑死亡的立法，欧盟的立法，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立法，新加坡的立法，都掺杂了本地区或本国家的特点在内，是不一样的。举例说，我们国家台湾死亡的立法中脑死亡与呼吸死亡是并行的，病人的家属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，这就更加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。

但是即使有了脑死亡的诊断标准，要实施起来，困难也是较多的。从基层医院来说，有些设备都没有，同时可能有理论学的问题。现在国外的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脑死亡是非常严谨的，判断脑死亡是包括内科、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专家，包括麻醉学家，包括其他学科的专家，还有伦理学家在一起宣布脑死亡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慎重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国家首先是在一个法律条件下，这涉及到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。在没有条件的单位是不能宣布脑死亡的。只能在有条件的医院，在我国内，也只能是在国家级的大医院或省市的大医院可以首先进行。

因此，脑死亡的立法和实施，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
相关链接

脑死亡立法 应慎之又慎

人命关天，“脑死亡”一提出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有法学界专家认为：“生死问题”必然影响到社会道德、伦理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变化，对待“脑死亡”要谨慎。

“脑死亡”冲击传统观念 据了解，所谓“脑死亡”就是指当事人如果出现脑死亡，不论是否还有呼吸和心跳就表明此人已死亡。但在目前法律和临床上，许多人认为这是有悖日常观念的。因为人们一直以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的停止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准，而这一观念已渗透影响到人的观念和社会的各项制度中。

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舒国滢认为，如果实行了“脑死亡”，势必对社会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。首先，“脑死亡”必然在社会文化认识上产生冲击，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、法律层面的死亡和“脑死亡”产生认识冲突。其次，在社会制度方面，也影响到法律内涵的冲突。

一些“伤害”将成“死亡” 舒国滢认为，在法律方面，影响最多的是对于伤害与死亡的界限问题，如果实行“脑死亡”，对于法律中的死亡要重新界定。比如“重伤”或者“杀人未遂”而出现的“脑死亡”就可能成为“伤害致死”“杀人既遂”等。这些影响，也会具体地反映到每个人的生活中。在家庭关系中，如果一方已被宣布“脑死亡”，虽然他的心仍在跳动，仍在呼吸，但是他的亲属就可以开始继承他的财产，他的配偶就可以不必经过离婚手续而与他人结婚。

“脑死亡”有谋杀患者之嫌 在医疗方面，在患者处于“脑死亡”后医生就可以宣布患者死亡，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以及患者家属的精神痛苦。另外，还可以将仍能使用的患者器官及时进行移植，以供给其他患者。舒国滢教授认为，这里同样存在风险，如果患者家属与医生有某种协议，就可以很容易地谋杀患者。

“脑死亡”立法应谨慎 舒国滢教授认为，现在主张“脑死亡”的基础不外乎以下几种，但主要是为了“减负”。一是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，减少患者家属与社会的治疗压力。二是降低患者本人的痛苦，让患者“死”得有尊严。三是更多地为社会谋利，在“脑死亡”后患者的身体器官可作为他人治疗的替代器官。

同时，舒国滢说，不能以价值来决定一个生命要不要存在。由于“死亡”对一个人来说特别重要，可能影响他对自己本身的认识，对社会而言死亡标准的变化也会引起价值观念、法律制度的变化，所以，在当前情况下，“脑死亡”的立法应谨慎。